同为抗战时期为鼓舞民族抗战所写就的经典历史著作，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与钱宾四的《国史大纲》正代表了两种类型的史学。《国史大纲》积传统史学功夫及与时俱进的眼光以半文半白写成，宏大而沉重。《中国近代史》似乎更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文字带有民国年间白话文写作刚普及时的平实、简易，亦不失为其魅力所在。

阅读《中国近代史》之时，处处可体会到民国时期对国家民族怀有强烈热忱与信念的知识分子的救国之情，一种在当今的中国已经不见的赤子之心。《国史大纲》呼唤民族精神、古典文明的回归，《中国近代史》则呼吁彻底的学习科学、法制为代表的西方文明，以真正实现近代化。若求“中华”的现代化，两公所言实为一件事。

较之官修的近代史讲义，蒋氏著作固然在史料、细节上简略得多，但摒却了千篇一律、机械僵化、言之无物的理论教条，因此对历史事件、人物的品评亦立体而有见地。太平天国的得失、义和团运动的性质等等，或许蒋廷黻并没有现代学者那般丰富详实的资可供借鉴，但对历史的尊重，是任何官修教科书所没有的。讽刺的是，民国时期的学者，包括梁启超与蒋廷黻在内，尚能对李鸿章给予功过得当之品评，自诩人民史观者，却喜将责任与错误统统掷在一人的肩上。

当然，蒋氏的工作不过是近代史的起步。叹惋的是，良好的开头并没有能够延续，尚不知要待几时启迪民智的责任方得再次被扛起。